

明治日本的「自由帝國主義」與 臺灣統治論： 從福澤諭吉到竹越與三郎*

藍弘岳**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副研究員

本文從全球史視野，討論福澤諭吉與其所主導的《時事新報》，及在知識系譜上與福澤有所關聯的竹越與三郎如何論述臺灣和殖民統治臺灣的意義等問題。他們如歐洲的自由帝國主義者，在日本國內政治方面雖持自由主義觀點，但在對外政策、殖民地政策方面發表帝國主義式言論。歐洲的進步使歐洲的許多自由主義者肯定帝國的擴張。我們可看到許多明治日本的自由派知識人大抵也有類似看法，儘管他們自身也非歐洲人。但歐洲自由主義者和本文所論的明治日本自由主義者對於其殖民地的看法還是有差異，其間的關聯和差異將是本論文討論的問題。

關鍵字：自由主義、臺灣、殖民地、福澤諭吉、竹越與三郎

* 本文曾於「第九屆台日亞洲未來論壇：帝國日本的知識與其殖民地：臺灣與朝鮮」國際研討會（臺灣大學，2019/5/31）口頭發表過，特別感謝張隆志教授的評論，及與會學者的提問，使本文能進一步發展。同時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給許多具啟發性的意見，使本人獲益良多，並感謝陳乃倩同學對本文的校閱。又，本文是科技部 106-2628-H-009-001-MY3 計畫成果之一。

** 通訊作者，E-mail: hungyueh7@gmail.com

收稿日期：108 年 9 月 3 日；接受刊登日期：109 年 1 月 30 日

壹、前言

一人不剩地殲滅反抗我之島民等，……以兵力毫無赦免地進行掃蕩，使之葉枯根絕，殲滅一切醜類。如土地等即全部沒收，當以舉全島為官有地的覺悟來進行偉大英明的決斷。(福澤諭吉，1961b: 355)¹

這是在芝山巖事件後，發表在福澤諭吉（1835-1901）主編的《時事新報》社論的一段文字。被認為是明治自由主義代表知識人的福澤何以不僅私毫不重視其殖民地人民的人權，且連「一人不剩地殲滅反抗我之島民」這樣的言論都說得出來！有臺灣學者批評福澤，說：「對臺灣以及臺灣人，完全缺乏理解，見解這麼幼稚的人，竟被眾人稱為最偉大的啓蒙思想家」（許介麟，2009: 54）。身在今日臺灣，對這段話感到氣憤是相當自然的。然而，這段話在何種程度上可理解為那位重視個人獨立自主的福澤諭吉之言論？這段話存在的具體語境為何？我們該如何在全球史與日本史的雙重視野中來理解這段話？這些都是有待吾人思考的問題。

日本在占領臺灣後，關於應如何定位臺灣、如何統治臺灣的問題引起許多討論，各種意見都有（小熊英二，1998: 70-119）。但在上述這些疑問的引導下，本文擬特別以福澤諭吉、竹越與三郎等自由派知識人為主，討論明治日本的臺灣統治論。² 其實，「自由主義」這個語詞與其相關思想內容的討

1 此文的翻譯是在儘量尊重、使用原日文中所使用漢字的想法下所翻譯出來的，故一般臺灣讀者或會覺得其語句有些奇怪。以下的翻譯亦同。

2 在堆積如山的福澤諭吉相關研究論文中，有關其臺灣論的論文並不算多。在臺灣學者的研究方面，除上述許介麟的論文外，尚有吳密察（1991）等人的論文。這些論文皆主要從臺灣史觀點來討論福澤諭吉的臺灣論。首先，吳密察的論文已先於本文，非常仔細地討論過福澤諭吉的臺灣論，並站在臺灣的觀點批評其論中的利己思想，且對比、批判其文明論所呈現的虛偽。其次，楊素霞（2006）中也討論過相關問題，但將重點放在《時事新報》社論中對漢人統治和拓殖務省問題之看法的分析上。她主張 1897 年 5 月的「國籍選擇」到期，但依然有大量漢人選擇留在臺灣，這是令《時事新報》社論改變對漢人統治之看法，並改主張廢止拓殖務省的原因。

論早已出現在明治思想家的著作中（陸羯南，1891: 89-104）。如本文欲討論的福澤諭吉等人的情況可知，早在明治時期或更早之前，講論「自由」、「人權」等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文本就已傳到日本，對明治以後日本思想史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武田清子，1987: 3-37）。本文主要從政治思想史觀點，將這些在明治時期受自由主義思想影響並推進議會政治等的人們理解為明治日本自由派知識人。

一般而言在明治時期，自由主義是推進文明開化、議會政治、政黨政治的思想，但在明治憲法體制確定之後，英美系統的自由主義被視為反政府、反國家的危險思想。在大正民主時期，雖通過護憲運動、社會改革運動等，有人企圖使自由主義重生，但依然無法使其成為主流思想，而最終被軍國主義的大潮吞沒（田中浩，2000: 16）。另一方面，早在明治時期，如福澤雖依然對內主張議會政治與民權，然在甲午戰爭爆發時，就支持對清戰爭、擁護殖民地的占有。³事實上，不只福澤諭吉，如其學生竹越與三郎（1865-1950）

另外，如後述，在日本與福澤的臺灣論相關研究方面，大都是在討論福澤的脫亞論、亞洲論脈絡中論及的。在這一論爭之前，藤原敬子（1987）也發表過相關主題的論文。藤原的論文與本論文一樣，非常仔細地言及《時事新報》中的各種臺灣論，主要強調福澤之論與後藤新平的臺灣統治政策之關聯。

3 一位審查人希望補述日本國內有關福澤定位的討論，以更清楚凸顯本論文的意義。關於這一問題，首先丸山真男（1947: 107; 1952: 122）從二戰中期開始展開的福澤諭吉研究，從「市民社會的思想家」、「市民的自由主義的政治觀」的角度，更加從正面確定了福澤諭吉的自由主義者形象。但是，丸山並非完全無視福澤在國際政治論方面，重視「國權」乃至具蔑視亞洲、認可對中國和朝鮮之侵略的言論。丸山（1952: 142-148）其實早就注意到在《通俗國權論》、《通俗民權論》階段，福澤開始提出「百卷萬國公法不如數門大砲」這類權力政治（might is right）的主張。丸山（1949: 74-75）甚至指出在甲午戰爭之後，包括福澤諭吉在內許多民權論者皆成為「帝國主義者」。只是丸山強調福澤具一種丸山稱為「狀況的思考」（中文可譯為「狀況性思考」）、實用主義式的思惟方法，並依「國家理性」論主張福澤在現實的國際政治中，不得不據「國家理性」而擁抱那些蔑視和侵略亞洲的言論。而且，丸山也指出福澤的這種實用主義式思考的危險性，只是他沒有進一步去批判後期福澤之東亞政略論潛藏的諸種問題（關於上述看法，參閱松澤弘陽（2001）為《福澤諭吉の哲學：他六篇》所寫的解說）。就先行研究史的檢討方面，在自由主義者這一形象的延伸上面，有安西敏三（2007）《福澤諭吉と自由主義：個人・自治・國體》等論著。

另一方面，日本講座派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服部之總寫過〈福澤諭吉〉一文，在評價丸山之論的同時，也從馬克思主義史觀主張福澤不是「典型的市民的自由主義者」，而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之絕對主義時期的代表思想家（服部之總，1955: 188-205）。其次，丸

等人在二十世紀初前後，對日本國內政治持自由主義觀點的思想家在對外政策方面常發表肯定擴張、殖民統治的言論。這種思想可稱為「自由帝國主義」(liberal imperialism)，在福澤諭吉與《時事新報》的其他主筆的臺灣論中雖未實際上使用該語詞，但如後述，我們不僅可從這個觀點來理解實際上使用該詞的竹越與三郎之思想外，更可上溯去以之解釋甲午戰後福澤晚期的東亞政略論（包括臺灣統治論）⁴。

實際上，對內部強調自由、平等，對外以文明化之名合理化其殖民地統治的正是近代歐洲自由主義思想的主要面貌。自由主義通常意味尊重個人權利、進步與法治等價值，但自由主義卻也隨近代歐洲帝國的擴張而受影響。十九世紀早期的英法自由主義者轉向帝國，因為歐洲的進步賦與歐洲人權威，使他們相信可暫不施行運用於其自身的道德和政治標準於非歐洲人 (Pitts, 2005: 11)。我們可看到明治日本自由派知識人大抵也是如此，但還是有差

山的好友兼論敵竹內好也在〈日本とアジア〉(1961)、〈日本のアジア主義〉(1963)等文中討論福澤諭吉的文明論與〈脫亞論〉，一方面清楚認識到福澤諭吉思想中面對當時世界局勢後所具有的現實主義面相，一方面傾向將福澤理解為導致近代日本脫亞入歐路線的發展和蔑視乃至侵略亞洲的思想人物（竹內好，1966: 231-317）。後來，竹內好所強調的面相在安川壽之輔《福澤諭吉のアジア認識：日本近代史像をとらえ返す》(2000)等書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並批判丸山的福澤諭吉論。他認為福澤諭吉早期在《學問のすゝめ》中的「一身獨立一國獨立」這種被認為是具自由主義思想的主張就已傾向國權論，後來更成為蔑視亞洲的帝國主義者。但是因為安川所使用的資料有許多是使用《福澤諭吉全集》中收錄的《時事新報》的社論，而如本文中的討論，這些社論是否都可視為福澤之論是個有爭議的問題；平山洋（2004）在《福澤諭吉の眞實》展開相關的討論，但如後述，平山的討論也被批評。在這論爭之後，無疑地我們必須以更謹慎的態度來進行相關研究。

又，相較於丸山真男從「狀況性思考」和「國家理性」的角度來理解福澤後期的國際政治論，本文從全球史觀點，以「自由帝國主義」的角度切入解釋之。

4 關於這一點，月脚達彦（2015: 262-265）在福澤諭吉的朝鮮論問題也有類似看法。本文的這一論點也受該書啓發。另外如後述，「自由帝國主義」(liberal imperialism) 是大英帝國自由黨的羅斯伯里伯爵 (Archibald Primrose, 5th Earl of Rosebery, 1847-1929) 在 1895 年擔任首相時所提出，以主張自由黨在對外政策方面當行擴張政策。然也有學者更廣義地且不限定特定時代地使用該詞，以之指涉自由主義者對其所屬帝國之對外擴張政策、殖民政策的辯護等 (Mantena, 2010: 21-55)。本文所使用的「自由帝國主義」也具後者的意義，然主要是從與大英帝國自由黨之「自由帝國主義」政策論同時代的視角來解讀福澤諭吉和竹越與三郎之政治思想的。即主要是以竹越與三郎所理解、使用的日文譯詞「自由帝國主義」為基準來使用的。

異。其差異為何？這將是本論文討論的問題。

另外，同樣被視為明治自由主義者的福澤諭吉和竹越與三郎之間也有差異。首先，兩人的世代不同。按德富蘇峰（1863-1957）世代論的觀點，福澤諭吉屬「天保老人」，自己則是「新日本青年」（「明治青年」）（德富蘇峰，1887: 1-24）；而本文要討論的另一人竹越與三郎也是「明治青年」代表。但竹越也被認為是在知識系譜上與福澤諭吉、陸奧宗光（1844-1897）和西園寺公望（1849-1940）等一脈相傳的自由派知識人（西田毅，2015: 3）。他不僅關心臺灣問題，也對日本的南進政策、殖民政策的發展有所貢獻。⁵

所以，本文擬在全球史的視野中，討論福澤諭吉與其所主導的《時事新報》，及在知識系譜上與福澤有所關聯的竹越與三郎如何在其國際政治和日本史知識的延伸中，論述臺灣和殖民統治臺灣的意義等問題。即本文以明治日本自由派知識人為主來探究明治日本之臺灣統治論，藉此論析自由主義和自由帝國主義在日本展開的一個面相，及臺灣在明治時期如何被理解、討論的問題。

貳、福澤諭吉主導的《時事新報》中之臺灣統治論

一、福澤諭吉與《時事新報》中之社論

甲午戰爭後，《時事新報》發表了許多與臺灣有關的社論。但收錄在《福澤諭吉全集》中之《時事新報》言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視為福澤諭吉本人的言論是個學術論爭的問題。⁶ 本文認為《福澤諭吉全集》中所載《時事新

5 就臺灣論或臺灣史論方面而言，西田毅（2015）有從殖民經營論的角度簡單論及竹越的臺灣殖民論相關問題，但其論述偏重於殖民政策論與朝鮮論。主要以其臺灣認識與歷史書寫的相關問題為主題則有張隆志（2006）和邱雅芳（2017）《帝國浮夢》第一章。張隆志從殖民現代性與比較歷史的觀點着手，以竹越的《臺灣統治志》為主要分析文本，探討日本殖民論述在臺灣的建構過程與效應。張隆志分析竹越如何肯定地評論後藤新平的臺灣統治政策以展現日本人經營臺灣的成功，並說明竹越的臺灣殖民論影響了西方人的臺灣觀，及成為戰後殖民統治論的濫觴。邱雅芳是以竹越的《臺灣統治志》、《南國記》為分析對象，以「東方主義」、文化與帝國主義的觀點來討論竹越的臺灣書寫與南進論之間的關係。

6 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為《福澤諭吉全集》中收錄的〈時事新報論集〉大部分是無署名的社論，其中有非福澤執筆，而是其弟子石河幹明等人所寫的。所以，井田進也提出當以語彙和文

報》社論雖有許多篇是由他人起稿，但為福澤諭吉立意並添削過的文章，故當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代表福澤的意見。而且，如平石直昭（2010: 132）所指出的：「為整體地理解多面相、多層次的福澤思想，通過這些時事論集，我們在何種程度上能按內在理路探索隨狀況而多元變化的福澤思考軌跡這種分析的觀點，是更重要的」。本文採取平石直昭的這一觀點來理解《時事新報》上的社論與福澤諭吉的關係。

事實上，福澤諭吉是民間獨立的記者，不斷地面對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故本就會有許多前後矛盾的論點，或因狀況差異而有不同的發言（都倉武之，2016: 403-404）。而且，在 1898 年福澤諭吉中風之前，他大抵會檢閱《時事新報》新聞內容（青木功一，2011: 452）。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將《時事新報》社論視為在福澤諭吉主導下，福澤與其他主筆所共同創作的文章。所以，本文不特別拘泥在究竟何為福澤真正所寫的社論這點，而是擬探究這些福澤本身乃至在其主導下之《時事新報》中，與臺灣相關社論（或被認為代表福澤的社論）⁷是如何在全球史的視野中展開的問題。

二、馬關條約與《時事新報》的臺灣統治論

在 1895 年 4 月 17 日馬關條約簽定之前，《時事新報》社論就在同年 4 月 4 日的社論〈休戰と平和とは關係なし〉中推測，日本應可得到臺灣和「盛京省地方」（福澤諭吉，1961b: 122）。1895 年 4 月 20 日的社論〈新領地の處分〉則主張日本對於新獲得的領地臺灣和「金州半島」（遼東半島上的金州）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取其地，人民則任其去留，然後要促進大量日本國民移居，使之成為「純然新日本國」（以下稱 A 案）。另一個建議是讓本來就居住在臺灣的「支那人」歸化為「日本人」，並讓「支那人種」繁殖，按「舊慣」統治（以下稱 B 案）（*ibid.*: 139-141）。有意思的是，該社論在解釋 B 案時，以德

體等來認定何為福澤起筆之社論（井田進也，1998）。後來，平山洋也繼承井田的認定方法，更進一步指出許多亞洲侵略論的社論大概都非是福澤直接執筆的，而是石河幹明所為（平山洋，2004; 2012）。平山之論有其道理之處，也被認為有過於武斷之處。該論後來招致平石直昭、都倉武之等人的檢討與批評（平石直昭，2010；都倉武之，2011; 2016）。

7 都倉武之（2016: 372-373）指出，與福澤諭吉同時代的人大都將福澤諭吉和《時事新報》視為一體。

川家康移封關東時，依其舊慣統治的例子來說明；但該文作者認為位於熱帶物產豐富的臺灣適合第一方案（A案），寒冷的金州則適合第二方案（B案）。

然後，〈臺灣割讓の利益〉（1895年5月17日）這篇社論則專門討論臺灣統治問題，認為不能以一時的經濟利益來理解獲得臺灣這塊殖民地的問題，認為臺灣島上除「支那人」外也有「生蕃」、「熟蕃」，他們的風俗習慣等與日本有異，統治初期一定難有收益，但臺灣「氣候溫暖、物產豐饒」，只要好好經營必定是「國家永遠的利益」。而且，就軍事角度來說，要完全統治臺灣，甚至壓制過去不服「支那之政令」的「生蕃、熟蕃」，日本軍隊必須時時保持戒心，故在臺灣的軍備「有助於維持軍隊士氣」（ibid.: 159-160）。

〈臺灣の處分法〉（1895年5月22日）這篇社論再提及〈新領地の處分〉中談的兩個方案，主張統治臺灣的方式當是A案，特別強調臺灣是「鴉片毒流行地」，故要以嚴法禁止，若有人民不服則任其離去，可從日本大量移民補充。該社論主張：「總之，關於臺灣的處分，我輩所希望的乃是，無需置其人民於眼中，以其土地物產為目的，斷行萬般新政」（ibid.: 163）。

在又過三個月後所發表的〈臺灣永遠の方針〉（1895年8月11日）中，由於經歷臺灣居民的抵抗後，該社論又再提出前述A與B兩案（ibid.: 264），更直接說A案的實例則是英法等國開發、殖民北美的情況，主張臺灣應適用A案。該文末更主張：「我輩所希望的乃是，其處分法仿彼盎格魯撒克遜人種開發亞米利加大陸之筆法，將無知蒙昧的萬民悉逐於境外，讓日本人手握殖產上一切權力，確定舉其全土斷然日本化的方針，逐步實行，以期永遠的大利益」（ibid.: 266）。也就說，這篇《時事新報》的社論主張不是臺灣人民，而是臺灣土地的「日本化」才是日本殖民臺灣的目的與利益。他們重視對臺灣土地的「殖產事業」，認為臺灣「地味豐饒，氣候溫暖」，是相當適合栽培米、茶、砂糖等作物的土地（ibid.: 265）。就此意義而言，我們可說，福澤主導的《時事新報》主要還是把臺灣視為一種移住殖民地和農業殖民地。

在隔兩天後發表的〈氣候と殖産〉（1895年8月13日）社論認為問題不在地理與氣候，而是在人。若以勤勉的日本人取代原本的「島民」，則必如虎添翼，快速發達進步，故主張移住「內地人民」到臺灣以使之「文明開化」（ibid.: 266-268）。在隔天發表的〈嚴重に處分す可し〉（1895年8月14日）

一文，《時事新報》以更強的語氣主張主要以「土地」為目的，故當行嚴法讓「土人」知難而退，離開臺灣（ibid.: 270）。這一論點如後述，其實反映了福澤諭吉對西洋文明論中訴諸於地理等停滯、專制的亞洲論的理解與批判；但問題是，他只認為日本有能力突破這種地理環境與氣候的限制，位在更南方的臺灣「島民」則是無望的。

接著，〈臺灣の豪族〉（1895年8月22日）這篇社論則認為過去有「族長政治」的問題，提醒要好好處理「臺灣的豪族」（即板橋林家等）的問題，不要讓移住到臺灣的日本人民落得當佃農的地步。該社論以日本戰國時代在征服新領地時，不是驅逐就是誅殺當地土豪的做法為例，認為日本政府對於有可能教唆人民反抗的豪族要嚴加處分（ibid.: 277-279）。從這一點可看出該社論作者對於殖民地統治的看法不僅吸收歐洲國家的議論，也源於其日本史的知識，有著某種尚武精神、習性，乃至因之而來的暴力言論。

總之，在經歷臺灣居民的抵抗後，《時事新報》在〈進取の方針〉（1895年10月10日）這篇社論中更加確定主張日本對臺的統治方針當是A方案。該報更以大英帝國為師，認為日本今後的方針只有「進取」，因為「進取即自守之方便，一國之自衛不可缺的處置」，日英兩國的合作也是因彼此方針是以「進取」為目的、利害相同的結果。也是在這樣的思惟上，該報〈人口の繁殖〉（1896年1月3日）這篇社論認為今後日本的人口勢必大量繁殖，而繁殖力甚盛的大英帝國開拓殖民地移植其人民的做法當可參考（ibid.: 301; 347-351）。從該報立場看來，「日本人種的繁殖力」不輸大英帝國，主張：「苟有空隙之土地時，向之謀日本人種之繁殖，以至恰如盎格魯撒克遜人種於今日世界般占有勢力」（ibid.: 352）。所以，臺灣的「蕃地」或「支那」、朝鮮乃至安南、暹羅和其他南洋諸島皆有許多無人占領或未開發的土地，這些皆可成為日本「進取」之對象（ibid.: 352）。而且，〈日本人は移植に適するや否や〉（1896年1月7日）這篇社論認為日本人一般的性質與大英帝國人一樣，喜「家居團圓」，故是最適合移植的人民（ibid.: 354）。但相較於大英帝國，該報在〈一國の自衛〉（1895年10月12日）這篇社論中，更強調進取以防衛的思惟，故也更重視殖民臺灣在日本之國防自衛上的意義（ibid.: 303）。

三、臺灣內部事件與《時事新報》的臺灣統治論

在上一節中，我們理解福澤諭吉所主導的《時事新報》是從日英合作、英俄對抗的國際政治環境，及以日本歷史經驗為參考，並以大英帝國殖民思想為師等思想背景展開其臺灣統治論的。但日本獲得臺灣後，其統治初期遇到臺灣人民的抵抗，即所謂土匪問題。正是在芝山巖事件發生時的情緒中，該報〈臺灣の騷動〉（1896年1月8日）這篇社論出現了我們在論文一開頭所引包括「一人不剩地殲滅反抗我之島民」的那段話。該社論按《時事新報》社論執筆者認定論的看法，屬福澤沒有干涉的社論（平山洋，2004: 172）。或是如此，但事實上我們很難證明某篇社論是否真的完全與福澤諭吉無關。就算福澤完全沒有干涉的某篇社論，大抵也是循著《時事新報》的立場，而這立場也會滲透著當時福澤的思想，其中某篇社論的論點也會持續在後來的社論中得到進一步的解釋與發揮。我們必須在這樣的脈絡中來理解這些社論。有意思的是，或是在福澤的介入下，在一星期後的社論〈臺灣善後の方針〉（1896年1月15日）中，論道：**「我輩所謂殲滅非謂併其種（醜？——筆者按）類而殲之。雖苟順從我之輩則當視之為日本良民，厚加保護，然只認表面的順從而以之為良民，乃大大的錯誤」**（福澤諭吉，1961b: 359）。其論的重點在於必須以戰時心態來處理這次事件，不要輕信表面順從者為良民，必須從嚴以軍法來處分亂民。這種強調要嚴行峻法的背後目的可能是，希望在臺漢人在選擇去留的期限前能主動離開臺灣。因為《時事新報》主張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本來目的是土地的繁昌」，這日本人自己就做不到，根本不需原本「島民之力」。所以原本的島民若無法適應日本的法律，則可強迫他們自己離開臺灣。這當是針對漢人所言之論，其口氣雖嚴，但背後目的似是建議將臺灣打造為一個日本人自己能控管的日本人移民地。所以，在緊接的其他社論中，他們大量論述移民的問題。如在〈移民と宗教〉（1896年1月17日）主張「日本的移植地」必須通用日語、必須傳入日本的宗教，而且在〈人民の移住と娼婦の出稼〉（1896年1月18日）中主張殖民地也是需要女性的性工作者。又在〈移民と航海〉（1896年1月25日）主張必須擴張航路、在〈移民の保護〉（1896年1月26日）主張保護移民等。另外，他們也在〈臺灣事

業の經營) (1896年2月9日) 中以大英帝國治理香港為例，談論到要建設臺灣的鐵路、港口、改善衛生環境等的迫切性 (ibid.: 359-377)。

在上述關於臺灣的社論後，《時事新報》又在1896年6月發生的雲林事件之後再度出現談到臺灣統治問題的社論〈臺灣の方針一變〉(1896年7月17日)。該社論言及「過般臺北附近之騷動」(芝山巖事件)後，重申須以強硬態度處理臺灣統治問題 (ibid.: 465)。在隔兩天後的〈臺灣施政の官吏〉(1896年7月19日)這篇社論即主張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問題方面，除「國防上之目的」外，就是要「開拓其土地，謀殖產興業，以為助我國力之發達」，並論及選擇適當總督與相關官僚之人才的必要 (ibid.: 466-467)。

之後，〈先づ大方針を定む可し〉(1896年7月29日)這篇社論又再提日本經營臺灣的大方針是要把臺灣當做「無人島」一樣，重點是在其「土地」而非「彼等島民」。比較重要的是，他們認為當利用此次事件，嚴罰參與者，把有關事件的嫌疑犯都驅逐境外，並沒收其土地財產 (ibid.: 472-474)。該社論並主張：「或以法律保護財產乃文明國之權利 (原文『通義』，筆者按)，……法律是由人智程度差異，其寬嚴程度不同之物，對未開蠻民行文明之法律不異於要車夫馬丁之輩習小笠原流禮法」 (ibid.: 473)。也就是說在該報立場看來，對於臺灣的殖民統治，其實可以不必將臺灣島民們視為對等的文明國國民來處理的。在隔兩天後的社論〈政令に従はざるものは退去せしむ可し〉(1896年7月31日)則再針對鴉片政策，主張發出嚴禁的命令，不從者即逐出境外。再約一星期後的〈臺灣島民の處分甚だ容易なり〉(1896年8月8日)這篇社論，提出「殺少數為助多數，政法之勵行為保護彼等」臺灣島民的思惟來討論臺灣統治問題 (ibid.: 472-479)。

然後又經過幾個月後，一直到了日本統治臺灣滿兩年的日期，也就是馬關條約所定之臺灣住民必須決定其去留的最後期限，〈臺灣の軍政民政を區別す可し〉(1897年5月4日)和隔天〈臺灣行政の改良〉(1897年5月5日)兩篇社論都談臺灣總督人選問題。在幾個星期後的〈臺灣當局者の人選〉(1897年5月25日)這篇社論談理想的臺灣總督人選最好不是軍人，而是具「新思想新知識的人物」 (ibid.: 667-669)。也是在這一思路的發展中，時隔一個月後，〈臺灣施政の革新〉(1897年6月20日)這篇社論再次討論理想的臺灣總督人選

問題，並批評在日本內地設置拓殖務省控制臺灣總督施政的現行方法。在約兩個星期後的〈臺灣を如何せん〉(1897年7月4日)社論中，則論及普魯士、法國對臺灣都曾有野心，並提醒日本政府要注意西方國家從「世界人道」觀點對日本的臺灣統治進行干涉的可能性(福澤諭吉，1961c: 10-12; 39-41)。

從上述的討論，我們可知在馬關條約簽定後，《時事新報》陸續出現許多臺灣統治相關的社論。另外，在臺灣人民抵抗並造成大量傷亡的芝山巖事件和雲林事件這兩個時間點，及馬關條約簽定的兩年後，即原臺灣住民必須決定其去留的最後期限左右也出現許多與臺灣相關的社論。其臺灣統治論從強硬堅持留島不留人，漸轉為要臺灣總督應是具「新思想新知識的人物」，並要注意「世界人道」等的主張。但與其說《時事新報》對臺灣統治的態度軟化，不如說是在臺灣住民選擇去留的期限到期後的新狀況中，議論方向有些修正。其議論方向從嚴懲亂民、希望不願順從日本統治的漢人能早日離開臺灣，到希望以文明新政來治理臺灣。其言論依然是對內談自由、民主，對外採取帝國主義式行動的兩套標準。正是在這點上，我們必須在全球史視野中，來思考福澤所主導的《時事新報》的臺灣統治論與其他歐洲自由主義思想的關係與異同。

參、全球史視野中之福澤諭吉與 《時事新報》的殖民論與臺灣統治論

以下，本文將檢討福澤在甲午戰爭前後的言論，考察這些言論與上述《時事新報》社論的關聯。但接下來，我們擬先檢討十九世紀大英帝國的自由主義者的相關論述。

一、十九世紀大英帝國的殖民論：以密爾和韋克菲爾德爲主

密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十九世紀大英帝國自由主義的代表知識人，他擁護女性權利且反對奴隸制，但同時也以文明化使命論的觀點支持大英帝國在印度的統治(竹內幸雄，2011: 98-99)。如前所述，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等十八世紀的大英帝國自由主義者會批評殖

民統治，認為殖民地只是一種「帝國華麗、炫耀的裝備。若帝國無法有經費維持這種裝備的話，則當放棄」（Smith, 1981: 946）。相較之，十九世紀早期的大英帝國自由主義者卻轉而支持帝國的擴張，相信可暫不施行運用於其自身的道德和政治標準於非歐洲人（Pitts, 2005: 11）。密爾在其名著《論自由》（*On Liberty*, 1859）中說：「專制是對付野蠻人的一種合法治理模式，假如結果是野蠻人取得了進步，那就證明實際上導致該結果的手段是合理的」（Mill, 2001: 14）。儘管密爾反對種族或生物學上的決定論，也相信人類是自然趨向進步的，但卻認為某些國家或民族本身缺乏進步的環境，因此大英帝國等歐洲國家則負有使所有人類進步的使命（Pitts, 2005: 136-139）。亦即在他的理解中，文明的專制是這些缺乏內部進步環境的民族之希望。

其次，密爾談論殖民時引用韋克菲爾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 1796-1862）的殖民論來說明外，韋克菲爾德在其著作 *A View of the Art of Colonization: With Present Reference to the British Empire: In Letters between a Statesman and a Colonist* (1849) 一書引用密爾在《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所說的「在現在的世界狀態中，殖民是古老且富裕的國家資本可以使用的最佳事業」（Wakefield, 2001: 32）等的話（谷口吉彥，1934: 369-376）。韋克菲爾德是十九世紀大英帝國的殖民理論家，他在上述書中，論及「對民眾的教育並沒有改變他們的命運，那只有使他們不滿，在這國家中，現在民眾教育的結果是憲章運動（chartism）與社會主義（socialism）」（Wakefield, 2001: 25），故主張殖民來解決該問題（如後述，這一想法被福澤諭吉注意到）。他提倡「組織化的殖民」（systematic colonization），認為國內的資本與人口會過剩，故大英帝國必須向海外進行有組織的殖民事業以輔助自由貿易，並以殖民地為農業發展用地和工業產品的新市場，移植人口和資本到殖民地以解決國內經濟與社會的困境、大眾的苦惱等問題（Wakefield, 2001: 128-146）。

二、福澤諭吉的文明論、殖民論與大英帝國

福澤諭吉的文明論和殖民論的建構至少當與上述兩人的思想相關。首先，密爾與福澤的關係已廣為人知，密爾的著作可說是福澤自由主義思想的主要來源之一（安西敏三，2007: 1-50）。上述《時事新報》中對於臺灣島民

的差別對待的想法，基本上也是與密爾一樣，但比密爾更加暴力。事實上，福澤諭吉在 1875 年出版的《文明論之概略》中的文明史論就深受密爾等近代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文明史論影響，福澤將世界文明分爲「文明國」、「半開之國」、「野蠻之國」，從而形成落後停滯的亞洲觀。但對西洋文明論中之停滯、專制的亞洲觀，福澤是有所批判的，否則他如何能告訴日本人民，位於亞洲之日本能成爲文明國？身爲亞洲知識人，福澤諭吉在這裏遇到情況與其他非西方的殖民地知識人在接受西方的民族主義思想時所陷入的困境類似——即他們一方面要承認西方現代性知識的普遍性與優越性，以其建立的民族主義等知識範式來理解自身的社會；另一方面其民族主義卻又致力於擺脫歐洲的統治，並強調自身民族的歷史文化認同與獨特性（Chatterjee, 1986: 7-11）。所以，他們要重新打造民族歷史以使之符合現代性價值並能彰顯傳統。就日本的情形來說，日本雖位處於亞洲，但其與淪陷爲歐洲國家殖民地的亞非殖民地的國族主義不同——日本在打造國族時，也同時建構爲殖民他者的帝國。福澤爲這樣的日本提供一種思路，即日本必須與中國乃至亞洲既有社會、文化切割開來，在一方面凸顯日本文明與西方文明的類似性，並學習西方國家的同時，一方面又指陳西方文明的不完美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福澤的知識思想在近代日本的發展道路上具有強烈代表性。

所以，福澤諭吉在《文明論之概略》中必須去論述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差異。福澤在該書第二章〈以西方文明爲目的之事〉中，深入中日兩國的歷史，主張中國史上的最高權威與最高權力皆集中於皇帝，所以有利於專制制度的形成。然而日本的情況則是，因中世以後武士興起，「至尊」（皇室）與「至強」（武家）有所區別，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但其間的緊張關係使日本人的精神得以運動，自由風氣容易發生（福澤諭吉，1995: 36-38）。所以，福澤主張日本較中國易吸收西方文明。

另一方面，在福澤的論述中，日本與中國是半開的、而西方是文明的。但在相對的意義上，日本與中國也是文明的，西方也有其問題。所以，西方文明需被更高尙的文明狀態相對化，不是絕對的標準與目的（福澤諭吉，1995: 25-29）。其進步觀念中，除強調知性進步並預設一種完成狀態的十八、十九世紀啓蒙主義、自由主義的進步觀之外，也融合進化論的進步觀，即著重無

限進步的可能性但也須弱肉強食地競爭的進步觀（丸山眞男，1986: 101）。在這種觀念下，他甚至可能比密爾更偏向以種族主義的角度來理解殖民地上的異族。

事實上，對近代西方歷史有深刻理解的福澤諭吉早看到海外殖民有其一定的意義。雖然在 1866 年出版的《西洋事情 初編》中，福澤（1958: 379-380）認為有「海外的領地」並不是大英帝國富強的真正原因，並不正面鼓吹殖民。在這一時期，他的看法可能受亞當·史密斯影響，認為殖民統治不利於大英帝國自身的政治與經濟。⁸然而在青年福澤看來，海外殖民地依然有其意義，主要就在於大英帝國過多人口得以移住該殖民地，而能發揮其才，並殖產興業以文明化該地。如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美國雖然後來獨立了，但由於語言習慣相通，故後來也成為英國人民最佳的移民地點。另外，像馬爾他（「マルタ」）這類軍港性質的殖民地，福澤（1958: 381）也理解到其重要性與意義。總之，青年時期的福澤諭吉並不正面鼓吹殖民，卻已理解經營殖民地有其利益，並從文明進步的角度來理解，認知那是種文明國家的證明。但畢竟 1866 年時的日本尚且未開國，更遑論殖民。

再者，在《文明論之概略》（1875 年刊）中，福澤以大英帝國為例，言及以向海外殖民來解決人口過度繁殖的問題。但在這一時期，福澤基本上認為比起海外殖民，以本國資本投資外國以獲取利益的這種「不勞而獲取利益之術」是更好的。因為海外殖民必須面對殖民地語言風俗習慣不同的問題，但資金的移動並沒有這個問題，故文明國家隨著文明化而人口增加的話，為解決增多的費用，會以借錢給外國（特別是未開發國家）的方式來賺取利息、獲得經費。反之，未文明化國家若向文明國家借錢的話，則會陷入更貧窮的境界，故福澤特別提醒已有外債的日本要注意這個問題（福澤諭吉，1995: 280-281）。然而，往後日本成為文明國家時，福澤並不會介意對未開發國家使用這種「不勞而獲取利益之術」。事實上，後來甲午戰後，他在 1895 年 1 月 28 日寫給高見龜的信件中就表明他贊成借款給朝鮮以賺取利息（福澤諭吉，2002b: 19）。

8 福澤（1958: 456）在如《西洋事情 外編》等比較早期著作中會引亞當·史密斯的著作。

對於海外殖民方面，本文特別注意到的是，福澤（1959a: 8-9）在《民情一新》（1879年刊）的〈民情一新緒言〉就明確引用韋克菲爾德（「ジッボン・ウラクフヒールド」）的殖民論來討論大英帝國民情的變化，即對於民眾的教育反而使民眾對現狀感到不平，進而導致憲章運動（「チャルチスム」、chartism）與社會主義（「ソシヤリズム」、socialism）發達的問題。福澤（1959a: 9）在引用後，說：「上述勸說殖民之法的辯論是這樣的情況，故當早點把過剩人口移往他處之說與本編所記，其旨雖異，亦可以窺見大英帝國民情之一般情況」。可見福澤早知韋克菲爾德的殖民論，及其將人口移往海外以避免社會主義發達、引發底層人民抗議的想法。上述《時事新報》的臺灣論中未再言及韋克菲爾德的殖民論，但其中以臺灣作為日本人民移住地的論述當是基於上述這樣思惟來立論的。

事實上，福澤在甲午戰爭前一年出版的《實業論》（1893年刊）中，就討論到日本已是「東洋的文明國」，且是「海國」，但海運卻不發達。並論及在這個時期，日本人口也已增加，既有人在思考、討論海外移民問題。在1892年寫給清岡邦之助的信件中，福澤也提及近來日本關於「海外移住」、「郵船或貨物運送業之擴張」的討論增多（福澤諭吉，1959b: 149; 2002a: 159）。本來在明治二十年代，日本的移住思想就從過去以北海道殖民為主的國內移住論轉換為海外移住論。其中的原因就是日本人口過剩的問題（外務省領事移住部編，1971: 6）。上述福澤之論符合這一趨勢。職是之故，其對日本人海外移民的看法應已不同於《文明論之概略》時期。

甲午戰爭爆發之後，福澤相當關心，不僅贊成對清國開戰，且在《時事新報》上投入相當大的精力，鼓勵日本國民捐款報國。他在1894年8月14日親筆署名所寫的社論〈私金義捐に就て〉中，論及他羨慕「英國之臣民」因其國勢而能橫行於世界。在日本國文明開化之後，發生的這個戰爭是日本「上下協同為謀國權擴張」的機會。他認為甲午一戰是身為先脫離「支那流陋習」成為「東洋文明之先導者」的日本，為整個「東洋文明」之「文明開進」而展開的戰爭；且不同於過去的內亂，是「三百年來我們祖先所不知的外戰」，若勝則日本人民也可在文明世界揚眉吐氣，故日本全國人民要儘可能地捐款報國。在這一社論中，福澤已擺出國權論者的姿態。後來，在1895

年1月17日寫給山口廣江的信件中，更感嘆自己有幸能躬逢此一盛事，說：「今要將鄰國支那朝鮮包羅入我文明之中這種畢生的愉快，真是期待之外的幸福」。在這種幸福感包圍中，及在終於揚眉吐氣之想法下，福澤自然不覺日本有「新領地」有何不好，並在他人的詢問下開始思考如何經營遼東半島上之新領地的問題（福澤諭吉，1961a: 514-515; 2002b: 8-9; 13）。

福澤在其私人信件中常言及朝鮮，但極少論及臺灣，只有在1895年5月22日寫給清岡俊的信件中，提及「臺灣之接收也麻煩」（福澤諭吉，2002b: 66）。如前述，在該天，《時事新報》刊出〈臺灣の處分法〉（1895年5月22日）這篇社論主張：「**無需置其人民於眼中，以其土地物產為目的，斷行萬般新政**」。這篇社論或非福澤所親自執筆之論，然此一論調其實並不違反上述福澤開始關注海外移民問題，在國權論立場上讚頌日本的文明化與勝利，且開始思考如何經營新領地等的議論。而且在這篇社論中，其實際上的論點與上述韋克菲爾德主張因國內資本與人口會過剩，故必須向海外尋求資本投資的市場與移植人民的土地的想法一致。其論曰：「**若日本內地的人口以每年增加五十萬的比率來算，則十年間會增加五百餘萬人，將內溢人口往外移是經世上的必要**」（福澤諭吉，1961b: 163）。在這觀點的延伸上，他主張臺灣當地人民自動離去是求之不得的，但若留下來，則必須禁止、改變吸鴉片等舊習，以防止該習慣逆流回日本內地。所以，留下來的人將必須如日本人一樣文明化（「日本化」），改變舊習。在後來的〈嚴重に處分す可し〉（1895年8月14日）一文，也主張除吸食鴉片外，「土人」辮髮和纏足等「野蠻的風習」都應令其改變，使之文明化。也是在這種思考的延伸上，在馬關條約簽定的兩年後，即原臺灣住民必須決定其去留的最後期限左右出現的臺灣相關社論，便開始主張在臺灣實施文明新政。

就當時全球的政策論述來說，大英帝國自由黨的羅斯伯里伯爵（Archibald Primrose, 5th Earl of Rosebery, 1847-1929）在1894年擔任首相。雖自由黨對內是以自由主義為原則的，在對外政策方面則開始推行其名為「自由帝國主義」（liberal imperialism）的擴張政策，⁹在1895年時，更具體闡釋「自由帝

9 王世宗譯之為「自由派的帝國主義」。

國主義」的意思為「維護大英帝國」、「為國人開闢移民新天地」、「掃除奴隸販賣的惡風」、「推廣傳教事業」、「發展英國商業」（王世宗，2001: 609）。¹⁰其實，如學者所指出的，到了羅斯伯里伯爵主政的時代，不論是自由黨或保守黨的主流思惟皆是維持與追求大英帝國利益的（ibid.: 609-610）。《時事新報》實際上也附應這種思惟，如上述在與臺灣統治相關社論中肯定地論及日本人往殖民地的移住、傳教、貿易等方面的問題。而且，他們也論及英國的對外政策和英俄間的對抗，更在〈日本と英國との同盟〉（1895年6月21日）一文中，主張日本素知「**文明立國的自利主義**」，故基於日英兩國各自的國家利益，兩國當結盟（福澤諭吉，1961b: 203-204; 216-218）。

我們可說《時事新報》上的臺灣論其實也是如上述，在當時國際間帝國競爭的視野中，參照了英國自由派知識人的文明論和殖民論，及處在戰爭勝利、獲得殖民地等新時勢和情況中，並考慮到其他如人口增加等日本社會問題的意見延伸上展開的。在福澤諭吉最晚年出版的《福翁百餘話》（1901年出版）中收錄〈立國〉（寫於1897年）一篇短文。該篇中，福澤說：「**既居於禽獸世界，相互爭生存，則不違擇其手段之美醜，或云權利義務、或說同盟義俠，只要是所謂萬國公法所允許的，則只要裝飾外在，其內在實際唯謀求自國利益即可**」（福澤諭吉，1959b: 411）。《時事新報》中的臺灣統治論並沒有違反福澤晚年的訓示。

同樣，也是在其晚年所寫的〈福澤全集緒言〉（1897）中，福澤（1958: 64）依然強調「自己所爭唯人權一方而已」，認為可將「國務的為政權」給當局者，但人民也要志於文明教育，培養政治思想，共同分擔國事。其對內的自由民主主張並未放棄，只是不施捨給尚未文明化的殖民地子民。所以，我們不能簡單斷定地說福澤諭吉在甲午戰後，放棄了自由主義，轉向為帝國主義者。只是在帝國主義已然興起的年代，也是在這種理解西方國家如何操作「萬國公法」的認知和「唯謀求自國利益」的思想中，福澤的思想會向對內提倡自由民主，對外肯定帝國主義行動的方向發展。福澤雖不自我主張

10 出自“A Speech at the Albert Hall, 5 July 1895.”詳見 *The Foreign Policy of Lord Rosebery: Two Chapters in Recent Politics, 1886 and 1892-5*, “Appendix,” p. 75.（轉引自王世宗，2001: 609）。

「自由帝國主義」，但按其思路，其思想會導向「自由帝國主義」。因為「自由帝國主義」是十九世紀時在大英帝國對外擴張的過程中發展出來的，福澤不僅學習大英帝國自由主義者對內治理的政治理論，也理解到他們為帝國對外殖民、擴張行為辯護的思路邏輯。

但身為一位後進帝國主義國家知識人，福澤的思考自然有不同於密爾等人之處。首先，福澤不僅從經濟、也從國防角度來談統治臺灣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福澤在面臨歐洲人的文明論中停滯的亞洲觀時，他一方面主張日本不同於其他亞洲國家，一方面又以歐洲人的文明論來處理日本對其他亞洲地區的殖民統治問題。這種兩套標準式的思惟以及以進取為防衛的觀點，大抵是日本這種後進帝國主義國家的特色。再者，福澤或其他《時事新報》的主筆似乎也參照日本史上封建武士領主對其土地的經營方法等，故有時其論述中會出現比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統治論更加暴力的言論。又，其對臺灣的殖民統治論中，所對比的對象並非大英帝國十九世紀對印度的統治，而是對早期北美大陸的征服與統治。這似乎透露出其對當時臺灣的漢人社會發展的無知或蔑視。而且，日本自身也是有待被文明化的他者，不管是福澤論吉或《時事新報》上的社論，其論中的文明化使命感並不如密爾等十九世紀前期歐洲自由主義者在看待印度等殖民地般自然，不視之為理所當然的道德責任。所以，《時事新報》後來社論雖主張在臺實施文明新政，該論背後儘管有源於西方國家的文明化理念與論述，但實際上有著更強的現實國際政治考量，及政治修辭的意味。因為當時日本必須文明化臺灣，以防止臺灣的舊習逆流日本，及西方國家以人道主義之名的干涉等，故日本必須以西方的文明標準加諸臺灣，以證明自己是個與能西方國家平起平坐的國家乃至帝國。當然，同時他們也可與西方自由派知識人一樣，以所統治對象尚未文明化，故可差別對待之。我們必須強調與密爾等英國自由主義者對印度殖民地統治的想法相較，福澤論吉等自由派知識人的殖民統治論實有著更多現實政治的考慮，及與西方對抗的思惟和隨之而來的一種緊張感覺。¹¹

那麼比福澤論吉更意識到日本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間之競爭關係的竹越

11 就這一問題，感謝一位審查人的提點。

與三郎又是如何展開其臺灣論述的呢？接下來，我們將討論這一問題。

肆、竹越與三郎的前期著作與其臺灣論

一、竹越與三郎的生涯與主要著作

竹越與三郎於慶應元年（1865）生於武藏國本庄宿（現為埼玉縣本庄市）。本姓清野，後於 1883 年繼承其伯父竹越藤平的家，故改姓竹越。他於 1879 年到東京中村敬宇主辦的同人社讀書，後於明治十四年（1881）轉到福澤諭吉辦的慶應義塾就讀。竹越與三郎早在 1883 年就職於福澤諭吉辦的時事新報社，但隔年就辭職，並離開慶應義塾，後並於《大阪公論》等報社工作，最後於 1890 年改入德富蘇峰主導的民友社。在這一期間，他於 1886 年在小崎弘道（1856-1938）主持的東京靈南坂教會受洗，與同志社出身的知識人有所交往。之後他進入民友社，陸續發表《格朗空》（1890）、《新日本史 上・中》（1891、1892）、《マコウレー》（1893）、《支那論》（1894）等著作而漸出名。但在 1895 年那一年，也因與德富蘇峰的立場逐漸分歧而離開民友社。竹越辭職後，短暫再入時事新報社，出版《二千五百年史》（1896），但到了 1896 年，竹越就創設開拓社，發行月刊雜誌《世界之日本》（1898 年 8 月改為週刊），直到明治 1900 年 3 月為止。之後，竹越轉戰政界，於 1900 年當選眾議院議員，後來連續當選五次，直到 1915 年落選為止。這中間他寫了《三叉書翰》（1903）、《臺灣統治志》（1905）、《比較殖民制度》（1906）、《南國記》（1910）等書。落選後的 1915 年到 1925 年間，竹越則主要專心於《日本經濟史》寫作，和編纂《明治天皇紀》。1922 年竹越被任命為貴族院敕選議員，之後他就一直擔任貴族院議員直到 1940 年被任命樞密顧問官為止。在這期間，他寫出《明日はどうなる》、《旋風裡の日本》、《日本の自畫像》等書，最後於 1950 年辭世（高坂盛彦，2002）。

如上，竹越的著作相當多，但主要集中在歷史與政治方面，特別是日本史乃其主要的研究範圍。也正是在對日本歷史與政治的關心基礎上，他論及殖民臺灣問題。

竹越與三郎之所以被認為是一位自由主義者，是因為同為「明治青年」

世代代表的德富蘇峰，其思想具皇室中心主義，並在二戰期間積極出版《皇國必勝論》等以鼓吹軍國主義；相較之，竹越則在 1896 年創立明治自由派風格的《世界之日本》雜誌，而其政治行動與思想也不與軍國主義的日本法西斯政權同調（武田清子，1987: 54）。也就是說，竹越雖對外贊成帝國主義的擴張，對內則堅持議會民主制度，這大抵是明治自由派的基調。以下，我們將來檢討其對臺灣的殖民統治論。

二、全球史視野下的對外政策論與臺灣

如前所述，竹越在甲午戰爭爆發之前，就已寫下《マコウレー》（1893），為寫出《大英帝國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1848）的著名大英帝國史家麥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立傳，而他自己也被稱為「日本的麥考利」。麥考利主張輝格史觀，書寫「人民歷史」（the history of people），受其影響的竹越也是承襲這種觀點（武田清子，1987: 56-68）。但這樣一位重視民眾力量的史家也十分熱衷於對外政策論。

竹越與三郎在甲午戰爭（1894）開始一個月之內就發表了《支那論》一書且大受好評。在該書中，他認為「蒸氣船的發明」縮短了國與國之間的距離，這是「島國」日本命運的第一次轉機。「歐洲強國」要在「東洋」伸張勢力，必須依賴「東洋固有的勢力」（日本和「支那」），則此為第二次轉機。又，在竹越看來，蘇伊士運河的開發，縮短了「亞細亞大陸」與「美國大陸」、「歐洲大陸」的距離，故是第三次轉機。最後，陸地帝國俄羅斯與海洋帝國大英帝國展開大搏鬥則是第四次轉機。竹越（1894: 4-13）認為就東洋形勢來看，英俄兩大巨人之戰的裁決投票者當是日本。也就是說，竹越是在具體的全球歷史進程與其對國際現勢的理解來展開其中國論的。他認為日本必須發展為縱橫太平洋的海洋帝國。

在日俄戰爭爆發的前夕，與竹越與三郎同世代的著名大英帝國地政學者與自由黨的帝國主義理論家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 1861-1947）在 1904 年 1 月 25 日發表了名為〈歷史的地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的演講，提出有名的「心臟地帶理論」。按麥金德的分析，歐洲主要外患是歐亞大陸內部的草原民族對海洋邊緣不斷的壓迫行動，他們不僅壓

迫歐洲，也征服了中國和印度。這導致大英帝國等歐洲的海洋邊緣國追尋新航路，進而成爲海上霸權，並反過頭來包圍一直威脅歐洲生存的陸權國家（land power，陸地帝國）。亦即在這所謂大航海的時代中，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大英帝國等歐洲海權國家（sea power）陸續且交替地稱霸海洋，占有許多海外殖民地。另一方面如後述，在十九世紀初的世界局勢中，當大英帝國已擁有許多的海外殖民地時，俄羅斯帝國取代蒙古帝國，已把其疆域拓展到亞洲的東邊、北太平洋，成爲名副其實的歐亞草原上的陸權國家／陸地帝國。而且，之後它向海洋帝國的方向發展，有望成爲世界霸主。然而在該論文的最後部分，麥金德認爲若具面臨海洋優越位置的日本成功聯合中國、進而推翻俄羅斯帝國，就能獲得豐碩的陸上資源。這也是他所擔心的黃禍（Mackinder, 1904: 421-437）。

的確，在這樣的英俄鬥爭的國際現勢中，在太平洋這邊，竹越與三郎認爲日本有其機會，有爲「求其新故鄉，建設『大日本』的天縱權利」（竹越與三郎，1894: 25）。但在日俄戰爭爆發的十年前，他還不把俄羅斯、大英帝國視爲對手，而是爭取成爲帝國主義國家的門票。在甲午戰爭前後，他認爲妨礙日本「興國之大業」的最大對手是與日本同樣面臨西洋帝國主義侵略的「支那」（「清國」）。因爲在十九世紀末，在南洋與日本的移民相競爭者就是中國人。竹越從這一觀點認爲日本在「外交的深憂大患」並非歐美，而在於「清國」。而且，他認爲最頑強抵抗日本國民之「膨脹性」者也是中國人（「支那人種」），把中國人形容爲「人種的侵略隊」，而最先會被襲擊的是從「海峽殖民地」至東南、黃海、支那海外，「北緯五十度至南緯四十度間之諸島」。所以，日本爲建設「大日本」，不得已必須劍擊中國（ibid.: 25; 31; 54-57; 97）。竹越之所以如此理解，主要還是因爲他認爲日本要成爲縱橫太平洋的海洋帝國，就必須向東南亞擴張勢力，即採南進的主張。

故相當重要的是，竹越在這本書中，主張不可拘泥於「亞洲」這種「地理的空名」而投向日清結盟，認爲日清結盟對日本根本沒有好處，只會把原本不是日本之敵人的法國與俄羅斯變成日本的敵人。在他看來，這種日清當結盟的亞洲主義論常被調換成日清英同盟論，但這其實是「大英帝國政治家之政略」（ibid.: 71-77）。因爲在當時全球史背景中，法國和俄羅斯正是大英

帝國對抗的對象，且法俄兩國於 1894 年正式締結同盟關係，而大英帝國也與日本和清朝中國採取等距離外交，為抑制俄羅斯南進而努力構築日清英同盟（森田德彥，2018: 94）。在這樣的背景下，竹越甚至主張與法、俄組成「攻擊同盟」以分割中國。正是在這種帝國主義國家彼此合縱連衡對抗的國際現勢中，竹越主張日本與清朝中國開戰，並要清朝中國割讓「臺灣島」，因臺灣乃遙控「福州之海灣」的要地，可為他日準備戰爭時的屯兵之地（竹越與三郎，1894: 106; 120）。

如上，竹越在相當早的時期就從國防軍事觀點，主張要以臺灣為戰利品，殖民臺灣，以之為南進據點。事實上，竹越與三郎於 1896 年寫出《二千五百年史》時，他就主張日本人是「由天風和海潮所送來的海國人種」（竹越與三郎，1896: 27）。按他的說明，首先屬於閃米特人種的腓尼基文明與含米特人種的印度亞利安文明在南島開始融合，形成日本祖先的海國人種，然後再沿菲律賓群島北上到日本列島。但相較於停留在南島並與南島中劣等人種融合而形成的「南島人種」；構成日本人祖先的「海國人種」來到日本後，與受支那文明影響的「支那人種」（蒙古人種）鬥爭而高度發達，且兩者的鬥爭是繼承擅長貿易與屬聲音文明的「海國人種」戰勝使用漢字的「支那人種」（ibid.: 25-32）。重要的是，他相信構成日本人核心的海國人民是來自南方的這一點。這似乎成為他的南進論乃至臺灣論的重要思想原點。總之，他當是著眼於世界史視野，在其日本論與中國論的延伸視角上，展開其臺灣論的。

所以，竹越於 1896 年 7 月在西園寺公望、陸奧宗光等自由主義者的支援下，創設開拓社，主編《世界之日本》這一本綜合性雜誌，一直到 1900 年 3 月為止，而該雜誌也秉持著企圖從全球史視野來理解日本的思惟。他希望日本能「走上世界的舞臺，從世界的見地來思考出經綸，以世界的胸宇在列國間周旋」（西田毅，1982: 92-94）。他在 1899 年的一場演說中，更以流行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大英帝國之「自由帝國主義」為師，主張日本當也要為世界之日本，「對內採用平民主義，與多數人民共同分享權利和負擔，向外則採用帝國主義，在文明國社會中，成為最頂端勢力之一」（竹越與三郎，1908: 125）。也是在這個時間點上，大英帝國在甲午戰後看到日本的實力而更加積極接近日本，欲構築同盟關係（森田德彥，2018: 96-98）。相應之，

竹越也從前述的日俄法同盟論轉向展望日英同盟論，但主張日本若要與大英帝國結盟，則必須擴張軍備（竹越與三郎，1908: 127-130）。

事實上，如前述羅斯伯里伯爵在 1895 年時已提出「自由帝國主義」的想法。然大英帝國自由黨人所主張的「自由帝國主義」的發展更與於 1899 年的第二次波耳戰爭有關，而竹越相當關注這一戰爭過程與相關問題（西田毅，1982: 102）。竹越認為自己所屬的政黨憲政黨所當採用的外交政策正是此時大英帝國自由黨人所提出的「自由帝國主義」。他強調這是「知國但不忘民，不忘國權也不忘民權」，即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平民主義」）內在結合的政治原理，並力主這是日本面對當前局勢的一種「進化」（竹越與三郎，1900: 2）。這種「自由帝國主義」的主張與當時流行的亞洲主義等不同，是對亞洲已無「義俠心」的帝國主義論（月脚達彥，2015: 264）。也就是在這種進化論思惟影響下以及追求國家利益的「自由帝國主義」思想的主導下，竹越懷抱著將日本打造成海洋帝國的夢想，並進而展開其臺灣統治論。

伍、《臺灣統治志》與其關聯著作中之臺灣統治論

一、世界殖民史中的臺灣

竹越與三郎於 1904 年 6 月日俄戰爭發生時訪問臺灣，然後在 1905 年 8 月又再度訪問臺灣，9 月便寫出《臺灣統治志》。相較於福澤諭吉的臺灣殖民統治論，《臺灣統治志》參考了大量的漢文、日文乃至許多歐洲語言的文獻。他是在這些既有的研究基礎上，展開其臺灣殖民統治論，確立日本研究殖民政策的基礎。¹²

竹越在《臺灣統治志》中，延續上述打造海洋帝國與自由帝國主義的思

12 他在書中提及西利（John Robert Seeley）的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 1883（譯本：シーレー，《大英帝國膨脹史論 前編》關口一郎、土岐孝太郎譯，東京：日本商業社，1900）；葉慈（John Yeats）的 *The Growth and Vicissitudes of Commerce, From B. C. 1500 to A. D. 1789: An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Industry and Intercourse of Civilised Nations*, 1872（譯本：ジョン・イーツ，《商業沿革史》河上謹一譯，東京：文部省編輯局，1885）；艾爾蘭（Alleyne Ireland）的 *Tropical Colonization*, 1899（アイルランド，《熱帶殖民地論》，但無譯本）等書。

路，主張殖民臺灣的目的即在證明日本不僅是海國人民，也是如大英帝國般能統治「異人種」的優等國民。他欲論證日本人也可能如白人「拓化未開之國土，施及文明之德澤」（竹越與三郎，1905: 1）。如上述，這基本上繼承十九世紀大英帝國自由主義者的思惟。不僅如此，他在該書中也強調在十九世紀後半發展開來的社會進化論的邏輯，認為靠海而不懂得海的民族將滅亡。反之，能向海洋發展，進而有殖民地的民族將能生生不息。就這點來說，竹越與前述的福澤一樣，都是受十九世紀後半社會進化論的影響，從進步史觀來論述日本與其殖民地擴張的主張。

但竹越比福澤更清楚地討論到十九世紀大英帝國的「帝國主義」（「帝國擴大主義」）。他據艾爾蘭（Walter Alleyne Ireland, 1871-1951）的《熱帶殖民地論》（*Tropical Colonization*, 1899），討論到倡導「帝國擴大主義」的有：西利（John Robert Seeley, 1834-1895）的《大英帝國膨脹史》（*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 1883）、歷史家弗魯德（James Anthony Froude, 1818-1894）的《西印度英人殖民志》（*The English in the West Indies: Or, The Bow of Ulysses*, 1888）、¹³ 詩人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的詩，還有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 1836-1914）等政治家。這些人就是十九世紀後期大英帝國的帝國主義鼓吹者與實踐者。竹越認同這樣的主張。在他看來，十八世紀以來英法間的大戰就是在爭奪與殖民地有關的海上霸權，而日本也必須參入這一競局中（竹越與三郎，1905: 8-9）。

竹越認為從羅馬、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到大英帝國等，過去世界上的霸權國皆以擴張殖民地為其增加勢力的政策，故皆以掌握「海權」為手段。依據竹越之論：(一)因為有殖民地即有安排調和本國活力之道，使資本、人物、勞力、才能皆然向外，切斷內部紛爭，使新勢力生於外。(二)殖民事業即是掌握海權之道，能使海運發達、貿易暢通。(三)有殖民地的民族，其於外交社會

13 但竹越在《臺灣統治志》的英文版中提及的書名是 *The History of English Colonization in the West Indies (Japanese Rule in Formosa, London, New York, Bombay and Calcutta: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7, p. vii)*。該書英文版的內容與日本版有出入，如《臺灣統治志》的前二章（〈殖民及び殖民國〉、〈臺灣にお於ける日本の統治〉）被改為“Brief Survey of Our Successes”一章。

的發言機會多。(四)殖民是一民族統治另一民族，故是發揮組織才能的好機會，也是顯示一民族的政治才能的好機會。所以，竹越認為「第一等國」除了要文明達到某種程度之外，也須有武力和相應資源，及殖民的勢力。在他看來，除大英帝國外，德國也開始積極於海軍的擴張，一度敗於大英帝國的法國也回復其殖民的勢力。特別是巴拿馬運河一旦開通，則大西洋與太平洋、歐洲與亞洲將更接近，大大縮短航程，世界的重心將轉至太平洋。所以，正是在這種競相獲得殖民地的帝國主義競爭中，特別是競爭的舞臺已轉移到太平洋的時代中，位於太平洋的日本必須成為殖民國家。在竹越看來，臺灣統治的成敗更是關乎「日本人民」是否能成為「太平洋的女王」的關鍵 (ibid.: 3-16)。

竹越據博利厄 (Pierre Paul Leroy-Beaulieu, 1843-1916) 的殖民地論，主張對日本而言，臺灣是非常理想的殖民地。他批判博利厄那種只有歐洲人有能力殖民之論。他主張日本人從政治上來說有兩種人，一種是長於武力、戰略之武士型人才，另一種是長於統治國民的管理型人才。在他看來，在占領臺灣時需要的是第一種人才，之後就由真正的政治家 (即第二種人才、指後藤新平) 來統治，故日本的臺灣統治比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更成功。他讚賞後藤主導的戶籍制度、警察制度等統治，認為其政策促進臺灣的近代化。並從經濟觀點論證日本統治臺灣比法國成功，他甚至認為若博利厄看到日本的臺灣統治成果，定會改寫其殖民論 (ibid.: 18-19; 22-23; 37)。

關於歐美的殖民制度方面，他反對過去法國統治阿爾及利亞所採取的那種同化主義，比較贊成大英帝國統治印度的那種間接統治的方式 (ibid.: 57)。在《臺灣統治志》中，他也展開殖民地論，把大英帝國殖民地分為：I「王領殖民地」、II「半自治殖民地」(有代議制度)、III「自治殖民地」、IV「特許會社管轄殖民地」(⇒王領殖民地)、V「保護國」等五種。法國殖民地則分為「郡縣殖民地」和「保護國」。

如上所述，在領有臺灣後，日本內部產生了是要將臺灣當做殖民地還是內地的論爭。竹越明確主張臺灣是與日本之人種、風俗等有差異的殖民地，故展開上述殖民地學研究。在他看來，臺灣總督權限大體上類似大英帝國王領殖民地的太守，但其握有兵權的部分，則類似法國殖民地的總督；然而大英帝國政府因其王領殖民地特質，其立法事務是由國王任命的評議會來執

行。就此點而言，臺灣的情況與大英帝國的王領殖民地類似。但他認為日本統治臺灣的制度雖接近大英帝國的行政評議會，大英帝國殖民地的行政評議會有指名的市民參加，臺灣卻只有行政官，這是要改善的一點。又，他以大英帝國殖民方針為準則，主張不該在臺灣施行憲法。另外也以荷蘭為鑑，主張殖民地官僚要學土語等，並主張給殖民地官僚較優渥的待遇（*ibid.*: 70; 77-78; 80-83）。

總之，相較於福澤諭吉，竹越更認識到日本已成為帝國主義國家，眼下正處於帝國主義競爭的狀態中。他一方面更廣泛地參照大英帝國、法國乃至荷蘭等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論來思考臺灣的殖民統治政策，另一方面則讚頌日本殖民臺灣的成功。

二、臺灣史論

《臺灣統治志》的另一重點是，竹越在既有的文獻與研究基礎上，陳述了他的臺灣史論。他認為早在明代嘉靖年間，在倭寇活躍的時期，日本人可能就已駐守臺灣。但後來有來自山西的支那人移民湧入，並開始爭奪原住民的土地資源等。總體而言，他相當批判清代中國政府的臺灣統治情況。有意思的是，關於臺灣，他認為「其土乃純粹支那的殖民地，非如近世所見殖民事業，由政府或公司主導的」（*ibid.*: 95-96; 191）。亦即清領時期的臺灣不是如香港、新加坡那種由歐洲國家政府或公司在向外殖民擴張過程中所占據的貿易據點、商業殖民地，而是一種在中國社會壓力下自然擴張形成的某種農業的移住殖民地。在《比較殖民制度》一書中，他也說：

古來全然驅逐先住民以母國新人種取而代之者，只有大英帝國在美國與支那在臺灣這兩件事而已。……實際上，殖民政策除人口移植外，也不可忘記統治之事。有苟服我之統治的一切異人種皆為我之臣民的濟世大志願，方始得語殖民政策（竹越與三郎，1906: 176）。

據上文我們可知，比起前述的援引美洲白人驅逐原住民為例來主張臺灣統治

論的福澤，晚福澤約十年後展開臺灣統治論的竹越並不主張移植日本人來臺灣，而主要是以大英帝國對印度的統治為模範來建構其臺灣統治論的。即他認為殖民政策不該只是人口的移植，也必須是要統治本來居住在地的「異人種」，使之為我「臣民」。

三、日本的臺灣統治政策評價

竹越在《臺灣統治志》中以兒玉、後藤時代的統治為主要探討對象，力陳日本的對臺統治是如何的成功。首先，臺灣的土地關係複雜，存在大租戶與小租戶的問題。竹越將大租戶與小租戶的關係理解為類似日本歷史中之諸侯與平民的關係，即諸侯（相當於大租戶）統治某片土地，但實際上不直接耕種，只收稅金，而耕種的農民間又有地主（小租戶）與佃農的關係，致使臺灣的土地關係複雜。他認為日本政府解決了臺灣的土地問題，這有如日本史上的「廢藩置縣」（竹越與三郎，1905: 215）。

其次，在竹越看來，判斷一國的殖民政策是否成功，必先看其財政。對於財政政策方面，他指出臺灣歷經日本十年的統治後，在明治 38 年已成爲全然能自給自足、無需殖民母國補助的殖民地，故認為這是臺灣財政的一大變革，十分成功。這相較於法國在經營「印度支那」已二十幾年尚需募集八千萬法郎的情況，是更值得稱賞的。另外，由政府專賣樟腦、鴉片和鹽等的政策也是非常成功的。事實上，在當年臺灣的純收入有一千二百六十五萬圓，其中有七百四萬二千八百二十六圓來自於專賣所得，也就是說專賣所得已占臺灣歲入的六成。竹越認為這是因臺灣是「熱帶農業殖民地」，必須找到租稅以外的發展方法。又，在他看來日本統治的情況，儘管臺灣人的租稅負擔比清朝統治時期重，但事實上官吏的貪污少、人民享有法律公平、物價穩定等等，故臺灣人民是受「文明之德澤」、感到生活幸福的（*ibid.*: 205-219; 220-222; 228; 236-238）。

再者，在政治制度方面，竹越認為在兒玉總督統治臺灣時，之所以「軍政」收斂、「民政」更張的重要原因就是警察機關的發達。在他看來，在臺灣這種「百事創草之地」，其社會狀態幼稚，故不能以「法令的政治」來統治，而必須施行「家長的政治」，即恩威並施的方式，讓長官個人的勢力得以隨處被感

知到。所以，臺灣的警務工作必須兼吏務，包括法令的下達等民政工作。他甚至認為在警察政治這一點，日本母國當學習臺灣。又，他也認為日本這種警察政治之所以卓有成效，是因其乃源於中國傳統的「保甲制度」。接著在專賣制度方面，比起福澤主張的嚴禁政策，竹越支持後藤新平推行的漸禁政策，並對在這種制度下生活的日本人極少有人吸食鴉片的情況感到一種「人種的自負」；而他對於食鹽和樟腦的專賣也都持支持態度（*ibid.*: 245-248; 251-272）。

然後，他對殖民地臺灣司法制度的見解也很有意思。首先，他對於在覆審法院中，被告的供詞必須由臺灣土話先翻為支那官話，再翻為日語的這一做法大為不解。詢問下才知道這是為了遵守過去要使臺灣居民尊重法廷的清朝舊慣之故。有意思的是，他在得知後認為這是讓「臺灣土人」對清國尚抱一絲希望的做法，有損帝國威信。但另一方面，他也認為因為「風俗慣習」不同，日本在臺灣的統治需要「特殊的法典」，認為可對臺灣人執行鞭刑等的做法，並從經濟觀點論述其合理性（*ibid.*: 310-312; 317-321）。

其次，非常重要的一點是，竹越認為日本在接下來的數十年中要把臺灣當做農業殖民地來經營。但當時臺灣存在著死亡率過多、生產率過低的問題，故他主張日本政府除了當致力於衛生以降低死亡率外，政府也要將自己當做地主來經營農產事業，並要招攬對岸大陸的移民過來當勞力使用。相較之下，他的這一點看法與要求日本人大量移民到臺灣的福澤之看法不同。就此而言，他認為要將全部島民的血液都化為日本人是不可可能的，而大量的中國人來到臺灣也完全不是問題，因為只要日本人掌握住政治產業的神經中樞即可。在這一點，他應是以大英帝國在對印度等熱帶殖民地的統治來做為參考依據的。他看到在世界各國的殖民地中，熱帶殖民地大都是從外國輸入勞力，且輸入勞力的殖民地其貿易能迅速發達（*ibid.*: 324-347）。

在統治原住民政策方面，竹越說過去清朝中國的政策是將生蕃視為「化外之民」、「以不治治之」，而到現在為止的日本總督府治理方針依然承襲此舊制。但在他看來，日本必須開發「生蕃地」才能打開這「天與之倉庫」。所以，他主張如大英帝國在婆羅洲（「ボル子ヲ」，現表記為「ボルネオ」¹⁴）所

14 「子」是片假名「ネ」的異體字，特別是在明治前期使用。

爲一樣，給予私人組織的開拓會社特許權，成立「生蕃地特許會社」，即讓有特許權的公司自由行使政權，政府則只監督該公司（*ibid.*: 348-379）。這當是學習大英帝國以東印度公司殖民印度等地的方法。

最後，竹越論及頡德（Benjamin Kidd, 1858-1916）於 1904 年 9 月在美國報紙中的社論。該論大抵意指今後世界文明國的生活必須依賴如棉花等熱帶地生產物，故統治熱帶地區是重要的；而他也從此一角度認識到臺灣的重要性，故順理成章地把臺灣定位爲熱帶農業殖民地，並加以延伸論及臺灣在茶、糖、米方面生產的政策。他也花了數章討論日本在臺灣的道路、港口、衛生、教育等方面的建設，及商業的發展，並讚許其成功（*ibid.*: 379-500）。

總之，就現實的歷史情況而言，當時日本憑藉著將自身打造爲海洋帝國的野望，已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競合賽局中戰勝俄羅斯，而竹越與三郎借助日本人種南來說及與南洋中國人移民的對抗意識下，主張南進論，並因此將臺灣視爲帝國擴張的重要據點。竹越與三郎的臺灣殖民統治論的想法主要是以大英帝國對印度、特別是對其熱帶殖民地的統治爲模範，從根本上將臺灣視爲農業殖民地。現實上竹越以大英帝國的自由帝國主義政策爲師，參照了許多大英帝國的擴張與殖民的論述。我們也可注意到比起福澤，竹越強調日台間「人種」「風俗習慣」的差異的問題，更具有文化相對主義的思惟。這應與其注意同時期的大英帝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政治思想和參照大英帝國對印度的間接統治做法有關。因爲這實際上也應對著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後半，在印度的統治政策從強調普遍的文明化使命、道德責任轉向以文化主義爲基調的間接統治這一歷史過程（Mantena, 2010）。

所以，竹越一方面因之而有與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對抗、結盟的問題意識與緊張感，一方面也以其邏輯和道理來合理化日本在臺灣的擴張與殖民。他並且還企圖通過與相對後進的殖民地經營國家法國在印度支那的統治做比較，來強調日本統治臺灣的成功。

陸、代結論

按竹越與三郎也引用過的西利這位活躍於維多利亞時代的大英帝國歷史

學家之論，大英帝國是在一個心不在焉的情況（in a fit of absence of mind）產生的（Seely, 1883: 8），即大英帝國的建立其實是在沒有什麼大戰略引導的情況下就發生了。但當西利在 1883 年說這段話時，其實是要呼籲大英帝國政府有意識地實行帝國主義政策，以對抗俄羅斯、美國等新興帝國主義國家（明克勒，2008: 8）。至於日本是在這樣一個歐洲強權已有意識地實行帝國主義的年代中成爲後進帝國主義國家。所以，儘管明治政府在對內的議會政治和對外的殖民地經營等皆處處有學習大英帝國的痕跡，但其在時間上的後進性與在空間上的亞洲性，使其不得不有意識地、有戰略地只在亞洲太平洋地域實行帝國主義的擴張，而其對臺灣的經營也必然會與大英帝國的殖民政策不同，須從防衛其他帝國的角度來看待。從全球史視角來看，日本帝國的興起自然不可能是心不在焉的，而是對歐洲帝國擴張之有意識的模仿與抵抗，進而有與競爭和結盟的欲望。只是在這一過程中，日本地緣政治上的位置和內在的制度與習俗等也都制約了其帝國擴張與殖民之政策。

不管是將臺灣視爲日本人移住殖民地的福澤諭吉或《時事新報》的其他主筆，或主張接受來自中國的大量移民以爲勞動力的竹越與三郎，都會從中國論的視野來理解臺灣問題，而且也都將臺灣視爲熱帶農業殖民地，並對西方國家（特別是大英帝國）共有一種欲模仿又抵抗、欲結盟又競爭的現實緊張感。在帝國競爭的國際現勢中，這種現實緊張感加上實際上日本也欠缺基督教等宗教背景原因，使得他們雖會使用文明化殖民地等的修辭，但究竟有多少文明化使命感、普遍的道德責任感在其中呢？如福澤晚年的訓示：「**只要是所謂萬國公法所允許的，則只要裝飾外在，其內在實際唯謀求自國利益即可**」。這才是硬道理！又，兩者之間，相較於竹越對臺灣的深度認識與論述，以福澤爲代表的《時事新報》主筆的認識是相對薄弱的，其欲將已是大量漢人移居地的臺灣打造爲日本人之移住殖民地的論述也是比較不切實際的。

再者，我們在本篇論文一開始看到的《時事新報》中有社論對殖民臺灣提出嚴厲看法。那筆調嚴厲的社論與其他相關社論雖應非福澤親自執筆之作，然其實並不脫離福澤諭吉對日本過去的歷史和大英帝國殖民歷史的理解與學習，及其晚年對「萬國公法」和帝國競爭之國際現勢的理解。其論背後的目的在於將臺灣打造爲一個日本人的移住殖民地，及將日本改造爲能與大

英帝國平起平坐乃至結盟的國家（主權國家、帝國）。職是之故，我們很難完全把《時事新報》中之臺灣統治論與福澤切割。畢竟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間本就不一定矛盾。況且，約莫至十九世紀以後，東亞的思想家就不得不在西方政治主導的國際情勢及其製造的思想框架中思考了。就是在這樣帝國並競的現實狀況中，福澤諭吉的思想會走向自由帝國主義，而竹越與三郎更自主地選擇自由帝國主義的路數。

從全球思想史的視角來說，當強調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相關文本、思想隨著西方帝國的擴張傳播到日本時，一方面刺激日本國內議會政治的發展，一方面這些自由主義思想的接受者也與同時期的許多西方自由主義者一樣，以進化、文明化之名認同並詮釋日本帝國的構築與擴張。儘管那時日本自身還是要承受、抵抗來自歐洲的文明化視線的。在這種全球史視野中展開的文明與野蠻的相對性歷史解釋中，不管是對竹越或福澤而言，臺灣在帝國版圖中的主要作用，除國防與經濟外，就是用來證明日本的文明化，即證明日本已成為夠格的文明國家。並且，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日本必須好好經營臺灣，「臺灣島民」也當在日本人賜予的「文明之德澤」下感到幸福。只是如前述，不管是福澤或竹越，他們要建設臺灣、文明化臺灣的論述更多出於現實的政治需要。而且，按其思惟邏輯，「臺灣島民」尚未文明化，風俗習慣等也與日本不同，故有時對之使用非文明的手段治理也是應該的。我們當然可以不如此想。然而，如果西方國家向東方之軍事擴張、制度推銷和普及（或曰文明化），及與之相隨的殖民地經營事業是某種全球史展開的結果，對於日本因在上述時間與空間力量的作用下殖民臺灣這一歷史事實，我們或不用過度將之理解為一種恩惠、或反之只是理解為一種恥辱。只是臺灣的確因此與中國有了不同的歷史——屬於臺灣人的歷史。

參考資料

A. 中文部分

王世宗

2001 〈「自由派的帝國主義」：英國對埃政策，一八九三至一八九四〉，《歐美研究》31(3):

571-615。(Wang, Shih-tsung, 2001, “‘Liberal Imperialism’: British Policy in Egypt, 1893-1894,” *A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31(3): 571-615.)

吳密察

1991 《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Wu, Mi-cha, 1991, *Studies in Modern History of Taiwan*. Taipei: Daw Shiang Publishing Co.)

明克勒

2008 《帝國統治世界的邏輯：從古羅馬到美國》，孟翰、閻振江（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Münkler, Herfried, 2008, *Imperien: Die Logik der Weltherrschaft—vom Alten Rom bis zu den Vereinigten Staate*, Han Meng and Zhen-jiang Yan (trans.).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邱雅芳

2017 《帝國浮夢：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南方想像》。臺北：聯經出版社。(Chiu, Ya-fang, 2017, *The Empire's Pipe Dream: The Imaginary South of Japanese Writer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張隆志

2006 〈知識建構、異己再現與統治宣傳：《臺灣統治志》（1905）和日本殖民論述的濫觴〉，見梅家玲（主編），《文化啓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頁 233-259。臺北：麥田出版社。(Chang, Lung-chih, 2006, “Knowledge Constructio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ther, and Propaganda: *Japanese Rule in Formosa* (1905) and the Origin of Japanese Colonial Discourse,” pp. 233-259 in Chia-ling Mei (ed.), *Cultural Enlightenment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許介麟

2009 《福澤諭吉：對朝鮮、臺灣的謀略》。臺北：文英堂出版社。(Hsu, Chieh-lin, 2009, *Fuzeyuji: dui zhao xian, taiwan de mou lue*. Taipei: Wenyingtang Publishing Co.)

楊素霞

2006 〈日治初期臺灣統治政策論的再考：以《時事新報》對漢人統治與拓殖務省問題的討論爲中心〉，《亞太研究論壇》33: 125-150。(Yang, Su-hsia, 2006, “Reconsideration of Colonial Polic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Japanese Taiwan: The Examination of *Jiji-Shinpō*'s Discussions on the Rule of Han Chinese and the Ministry of Colonial Affairs,” *Asia-Pacific Forum* 33: 125-150.)

B. 外文部分

丸山眞男

1947 〈福澤諭吉の哲學〉，見松澤弘陽（主編），《福澤諭吉の哲學：他六篇》，頁 66-118。東京：岩波文庫。(Maruyama, Masao, 1947, “The Philosophy of Fukuzawa Yukichi,” pp. 66-118 in Hiroaki Matsuzawa (ed.), *Fukuzawa Yukichi no tetsugaku: hoka roppen*. Tokyo: Iwanami Bunko.)

1949 〈明治國家の思想〉，見丸山眞男（著），《丸山眞男著作集第四卷》，頁 51-96。東京：岩波書店。(Maruyama, Masao, 1949, “Meiji kokka no shiso,” pp. 51-96 in his *Collected Works of Maruyama Masao Vol. 4*. Tokyo: Iwanami Shoten.)

1952 〈『福澤諭吉選集』第四卷解題〉，見松澤弘陽（主編），《福澤諭吉の哲學：他六篇》，頁 119-161。東京：岩波文庫。(Maruyama, Masao, 1952, “*Fukuzawa yukichi*

- senshū*. Vol. 4 Kaitei,” pp. 119-161 in Hiroaki Matsuzawa (ed.), *Fukuzawa Yukichi no tetsugaku : hoka roppen*. Tokyo: Iwanami Bunko.)
- 1986 《「文明論之概略」を読む 上》。東京：岩波新書。(Maruyama, Masao, 1986, *Bunmeiron no gairiyaku o yomu*. Tokyo: Iwanami Shoten.)
- 小熊英二
- 1998 《「日本人」の境界：沖繩・アイヌ・臺灣・朝鮮殖民地支配から復歸運動まで》。東京：新曜社。(Oguma, Eiji, 1998, *The Boundaries of “The Japanese”*. Tokyo: Shin-yosha Publishing Ltd.)
- 井田進也
- 1998 〈福澤諭吉『時事新報』論説の再認定——丸山眞男の旧福澤選集第四卷「解題」批判〉、《思想》891: 92-103。(Ida, Shinya, 1998, “Fukuzawa yukichi *Jiji-Shinpō* ronsetsu no sainintei,” *Thought* 891: 92-103.)
- 月脚達彦
- 2015 《福澤諭吉の朝鮮：日朝清関係のなかの「脱亞」》。東京：講談社。(Tsukiashi, Tatsuhiko, 2015, *Fukuzawa Yukichi no Chōsen: Nichi-Chō-Shin kankei no naka no “datsua”*. Tokyo: Kodansha Ltd.)
- 外務省領事移住部（編）
- 1971 《わが國の海外發展 移住百年の歩み（本篇）》。東京：外務省。(Consular Affairs Bureau (ed.), 1971, *Waga kokumin no kaigai hatten: ijū hyakunen no ayumi*. Toky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 平山洋
- 2004 《福澤諭吉の眞實》。東京：文春新書。(Hirayama, Yō, 2004, *Fukuzawa Yukichi no shinjitsu*. Tokyo: Bunshun Shinsho.)
- 2012 《アジア獨立論者 福澤諭吉 脱亞論・朝鮮滅亡論・尊王論をめぐる》。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Hirayama, Yō, 2012, *Ajia dokuritsu ronsha, Fukuzawa Yukichi: datsuaron, Chōsen metsubōron, sonnōron o megutte*. Kyoto: Minervashobo Co.)
- 平石直昭
- 2010 〈福澤諭吉と『時事新報』社説をめぐる〉、《福澤諭吉年鑑》37號。(Hiraishi, Naoaki, 2010, “Discussions on Fukuzawa Yukichi and *Jiji-Shinpō*,” *Fukuzawa Yukichi Yearbook* No. 37.)
- 田中浩
- 2000 《日本リベラリズムの系譜》。東京：朝日新聞社。(Tanaka, Hiroshi, 2000, *The Genealogy of Japanese Liberalism*. Tokyo: The Asahi Shimbun Co.)
- 安西敏三
- 2007 《福澤諭吉と自由主義：個人・自治・國體》。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Anzai, Toshimitsu, 2007, *Fukuzawa Yukichi and Liberalism*. Tokyo: Keio University Press.)
- 竹内好
- 1966 《日本とアジア 竹内好評論集第三卷》。東京：筑摩書房。(Takeuchi, Yoshimi, 1966, *Nihon to Ajia: Takeuchi Yoshimi hyōronshū Vol. 3*. Tokyo: Chikuma Shobō.)
- 竹内幸雄
- 2011 《自由主義とイギリス帝國：スミスの時代からイラク戦争まで》。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Takeuchi, Yukio, 2011, *Liberalism and the British Empire*. Kyoto: Miner-

vashobo Co.)

竹越與三郎

- 1894 《支那論》。東京：民友社。(Takekoshi, Yosaburō, 1894, *Shinaron*. Tokyo: Minyūsha.)
- 1896 《二千五百年史》。東京：警醒社書店。(Takekoshi, Yosaburō, 1896, *Nisen gohyakunen shi*. Tokyo: Keiseisha.)
- 1900 《世界之日本》第五卷 48 號。東京：開拓社。(Takekoshi, Yosaburō, 1900, *Sekai no Nihon* Vol. 5, No. 48. Tokyo: Kaitakusya.)
- 1905 《臺灣統治志》。東京：博文社。(Takekoshi, Yosaburō, 1905, *Japanese Rule in Formosa*. Tokyo: Hakubunkan.)
- 1906 《比較殖民制度》。東京：讀賣新聞社。(Takekoshi, Yosaburō, 1906, *Hikaku shokumin seido*. Tokyo: Yomiuri Shimbun.)
- 1908 〈現今政治上の形勢に就て〉, 見岩倉千次(編), 《三叉演説集》, 頁 118-142。東京：二酉社。(Takekoshi, Yosaburō, 1908,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pp. 118-142 in Senji Iwakura (ed.), *Sansa enzetsushū*. Tokyo: Niyūsha.)

西田毅

- 1982 〈「平民主義」から「自由帝國主義」へ——竹越三叉の政治思想〉, 《年報政治學》33: 75-105。(Nishida, Takeshi, 1982, “From ‘Heiminshugi’ to Liberal Imperialism: The Historical Variation of Takekoshi Sansa’s Political Ideas,” *The Annals of Japa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33: 75-105.)
- 2015 《竹越與三郎：世界的見地より經綸を案出す》。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Nishida, Takeshi, 2015, *Takekoshi Yosaburō: sekaiteki kenchi yori keirin o anshutsusu*. Kyoto: Minervashobo Co.)

谷口吉彦

- 1934 〈恐慌と蓄積と植民：ミルおよびウェークフィールドを中心として〉, 《經濟論叢》38(1): 369-376。(Taniguchi, Yoshihiko, 1934, “Depression, Accumulation and Colonization,” *The Economic Review* 38(1): 369-376.)

服部之總

- 1955 〈福澤諭吉〉, 見服部之總(著), 《服部之總著作集 第六卷》, 頁 188-205。東京：理論社。(Hattori, Shisō, 1955, “Fukuzawa Yukichi,” pp. 188-205 in his *Hattori Shisō chosaku shū* Vol. 6. Tokyo: Rironsha.)

松澤弘陽

- 2001 〈解説〉, 見松澤弘陽(主編), 《福澤諭吉の哲學：他六篇》, 頁 315-335。東京：岩波文庫。(Matsuzawa, Hiroaki, 2001, “Editorial Commentary,” pp. 315-335 in Hiroaki Matsuzawa (ed.), *Fukuzawa Yukichi no tetsugaku: hoka roppen*. Tokyo: Iwanami Bunko.)

武田清子

- 1987 《日本リベラリズムの稜線》。東京：岩波書店。(Takeda, Kiyoko, 1987, *Ridge of Japanese Liberalism*. Tokyo: Iwanami Shoten.)

青木功一

- 2011 《福澤諭吉のアジア》。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社。(Aoki, Koichi, 2011, *Fukuzawa Yukichi’s Asia*. Tokyo: Keio University Press.)

高坂盛彦

- 2002 《ある明治リベラリストの記録：孤高の戰鬥者 竹越與三郎傳》。東京：中央公

論新社。(Kōsaka, Morihiko, 2002, *The Biography of Takekoshi Yosaburō*. Tokyo: Chuokoron-Shinsha.)

都倉武之

2011 〈時事新報論說研究をめぐる諸問題〉，見青木功一（著），《福澤諭吉のアジア》，頁 447-473。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Tokura, Takeyuki, 2011, “Issues about Research of *Jiji-Shinpō*,” pp. 447-473 in Koichi Aoki’s *Fukuzawa Yukichi’s Asia*. Tokyo: Keio University Press.)

2016 〈福澤諭吉における執筆名義の一考察：時事新報論說執筆者認定論への批判〉，《武蔵野法學》5-6: 371-409。(Tokura, Takeyuki, 2016, “Fukuzawa Yukichi as a ‘Strategical’ Writer,” *Journal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5-6: 371-409.)

陸羯南

1891 《近時政論考》。東京：日本新聞社。(Kuga, Katsunan, 1891, *Kinjiseironkō*. Tokyo: Nihon Shinbunsha.)

森田徳彦

2018 《地政學の時代：リアリズムで迫る日本近代史》。東京：勁草書房。(Morita, Naruhiko, 2018, *Geopolitics*. Tokyo: Keiso Shobo.)

福澤諭吉

1958 《福澤諭吉全集 第一卷》。東京：岩波書店。(Fukuzawa, Yukichi, 1958, *Collected Works of Fukuzawa Yukichi Vol. 1*. Tokyo: Iwanami Shoten.)

1959a 《福澤諭吉全集 第五卷》。東京：岩波書店。(Fukuzawa, Yukichi, 1959a, *Collected Works of Fukuzawa Yukichi Vol. 5*. Tokyo: Iwanami Shoten.)

1959b 《福澤諭吉全集 第六卷》。東京：岩波書店。(Fukuzawa, Yukichi, 1959b, *Collected Works of Fukuzawa Yukichi Vol. 6*. Tokyo: Iwanami Shoten.)

1961a 《福澤諭吉全集 第十四卷》。東京：岩波書店。(Fukuzawa, Yukichi, 1961a, *Collected Works of Fukuzawa Yukichi Vol. 14*. Tokyo: Iwanami Shoten.)

1961b 《福澤諭吉全集 第十五卷》。東京：岩波書店。(Fukuzawa, Yukichi, 1961b, *Collected Works of Fukuzawa Yukichi Vol. 15*. Tokyo: Iwanami Shoten.)

1961c 《福澤諭吉全集 第十六卷》。東京：岩波書店。(Fukuzawa, Yukichi, 1961c, *Collected Works of Fukuzawa Yukichi Vol. 16*. Tokyo: Iwanami Shoten.)

1995 《文明論之概略》。東京：岩波文庫。(Fukuzawa, Yukichi, 1995, *An Outline of a Theory of Civilization*. Tokyo: Iwanami Bunko.)

2002a 《福澤諭吉書簡集 第七卷》。東京：岩波書店。(Fukuzawa, Yukichi, 2002a, *Collected Letters of Fukuzawa Yukichi Vol. 7*. Tokyo: Iwanami Shoten.)

2002b 《福澤諭吉書簡集 第八卷》。東京：岩波書店。(Fukuzawa, Yukichi, 2002b, *Collected Letters of Fukuzawa Yukichi Vol. 8*. Tokyo: Iwanami Shoten.)

徳富蘇峰

1887 《新日本之青年》。東京：集成社。(Tokutomi, Sohō, 1887, *The Young People of New Japan*. Tokyo: Shuseisha.)

藤原敬子

1987 〈福澤諭吉の植民論——後藤新平の臺灣統治政策と關聯して——〉，《福澤諭吉年鑑》13: 139-159。(Fujiwara, Keiko, 1987, “Fukuzawa Yukichi on Colonization,” *Fukuzawa Yukichi Yearbook* 13: 139-159.)

Chatterjee, Partha

1986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Zen Books.

Mackinder, Halford John

1904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3(4): 421-437.

Mantena, Karuna

2010 *Alibis of Empire: Henry Maine and the Ends of Liberal Imperialis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ill, John Stuart

2001 *On Liberty*. Kitchener, Ontario: Batoche Books.

Pitts, Jennifer

2005 *A Turn to Empire: The Rise of Imperial Liberalism in Britain and France*.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eely, John Robert

1883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Smith, Adam

1981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R. H. Campbell, Andrew S. Skinner, and W. B. Todd (eds.), 2 Vol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Wakefield, Edward Gibbon

2001 *A View of the Art of Colonization: With Present Reference to the British Empire: In Letters between a Statesman and a Colonist*. Kitchener, Ontario: Batoche Books.

“Liberal Imperialism” in Meiji Japan and the Discourses of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From Fukuzawa Yukichi to Takekoshi Yosaburō

Hung-yueh La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BSTRACT

The article begins with thorough examinations of the views of Fukuzawa Yukichi, other authors of *Jiji Shinpō* (*Current Events*) and Takekoshi Yosaburō on what Taiwan meant to Japan in the Meiji Era and proceeds to explore their discourses on how to rule Taiwa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history. They were like European Liberal Imperialists, tending to discuss issues of domestic politic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liberalism; however, on the other side, they also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erialism in foreign policies. In fact, success of the European empires prompted the European liberals to believe that they did not need to apply their moral and political standards to the non-European, and the liberals of the Meiji period upheld the same belief, although they were also non-Europeans. However, some differences remain in their views on colonial policies, and this article therefore showcases thes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Key Words: liberalism, Taiwan, colony, Fukuzawa Yukichi, Takekoshi Yosaburō